

## · 思路与方法 ·

# 试评恽铁樵中西汇通思想中的方法论

西安医科大学 张 文 韩中平

西医的传入及其影响日增，必然要向中医渗透。所以，中西汇通派的出现，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中的必然现象。中西医汇通(以下简称汇通)与中西医结合工作有很大区别，但它提供的经验教训，却可资借鉴。恽铁樵立足于保持和发扬中医的优良传统，提出了不少深刻的有关方法论的问题，对我们是有一定启迪的。

一、恽铁樵认为，汇通“不能使中医同化于西医，只能取西国学理，补助中医”。从西医中吸取营养是手段，目的在于发展中医学术。这就从方法论的高度抓住了要害。

恽铁樵认为必须对中西医进行比较研究，察其异同，做到知己知彼，才能对“何者当因，何者当革”，对如何“吸收他国新文明”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尽管恽铁樵对西医的知识有欠缺和片面之处，他把熟悉中西医学双方情况作为汇通的先决条件和出发点，却十分正确，对今天中西医结合工作，仍有重要意义。中西医结合是富有自觉性的理论研究，越是对中西医双方吃得透，才能消除盲目性，在行动中取得自由。

他强调，要解决汇通中的难点，必须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研究。在这方面他较唐宗海等人前进了一大步，摒弃了那种机械的把中西医概念对号入座的方法，指出不能用西医学说注释中医经典，认识到“中西医之不同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，”即不只是治法和药物的不同，而是根本方法不同之两种学说。他在强调这个根本区别的基础上，提出深入研究中西医各自的特点和长短，寻找二者的结合点或结合二者的突破口，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。尽管他本人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，但他提出这个问题，强调对中西医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，是有方法论价值的。

我们认为，对中西医的比较研究虽比过去重视，但仍是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。如果能对中西医学的理论体系、认识范畴、逻辑方法、临床思维特点、诊治手段的演变史等方面作系统的比较研究，揭示其内在规律，对中西医结合将会有很大帮助。

二、恽铁樵在中西医比较研究中，做了不少带有开创性的工作，提出一系列富有启示性的见解。

首先，中西医的理论基础不同。他从唯物主义的角度，对中医理论中关于天的概念作了阐发，指出宗教家的天和科学家的天之别。前者认为天是有意志

的；后者认为天是无意志的，“可以测量，可以研究，天行祸患，可以人力胜之”，《内经》中指的就是这种纯粹的科学家之天。他指出中医理论是建立在养生基础上的，《内经》的主旨“不在治病，而在养生”。强调人体与自然界的统一与平衡，重视调整人体生理机能以战胜疾病。西医则着重于机体组织结构的病理变化，重视寻找具体病因及其与机体相互作用的具体环节。对此，他概括为，“中西医学基础不同，外国以病灶定名，以细菌定名；中国则以脏腑定名，以气候定名，此因中西文化不同之故”。“即如欲火与微生物两说，太觉背道而驰了”。确实恽铁樵对微生物在发病中的作用的评价值有欠妥之处，但从两种理论体系的角度考察中西医的不同，是有见地的。

其次，中西医在临床思维特点上，使用的认识范畴体系有根本不同。西医使用的范畴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，疾病定位和机能变化相结合，是可以实验手段检验的。中医范畴则强调整体性和灵活性，有较大幅度的模糊性，接近于现代控制论中使用的符号系统，或类似现代模糊数学之类，它重在说明人体机能变化而不是具体结构变化。它长期有效的指导着实践，不掌握它就难以理解中医的理论实质。恽铁樵阐发说：“以五行说病，既不合生理病理，亦为近顷科学所不许。然病各脏之交互关系，有时用五行为说，精到有不可思议者”。以五行释病“实为现今医化学所不能窥见之事”。中医的脏腑学说不只是解剖概念；中医的五脏，“非解剖的五脏，乃气化的五脏”，不明此理，就会碰钉子。我们认为，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医的发展不是通过建立新范畴取代旧范畴，而是用旧范畴解释新经验的方法实现的。即使用同一范畴，也不是通过使它包涵的内容发生质变而赋予新义，而是对它原有内容加上新的解释实现的。试以西方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发展为例与中医作一比较。从孟德尔提出基因概念，摩尔根根据染色体为其物质载体的学说，确定了它的线性排列；沃森·克里克又进一步发现DNA双螺旋结构，确定了遗传密码，确定了由遗传密码到蛋白质的翻译原则。这一过程使人们对基因的理解越来越具体。中医则不同，它在发展原有范畴内容时缺少这种具体的可以定量的内容。例如，叶桂首倡卫气营血辨证，对温病学发展贡献很大，指出了温病的病

因、对脏腑的传变方式及治法都与伤寒不同。但他仍用《内经》的脏腑、卫气营血一类的概念。用旧范畴解释新的疾病现象，尽管在解释和应用上更加切合实际，但对旧范畴本身的内容并未作实质性的改变。可见，中医范畴远比西医范畴恒定，不掌握这点，就很难理解中医发展的特色。过分强调这点，也会使之成为中医发展缓慢的认识根源之一。因此，如何正确处理 and 改革中医的范畴体系，是解决既保持中医特色，又推动其前进的一大课题。

第三，中西医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指导思想不同。指导西医理论发展的原则是结构与机能相统一，采用的具体方法是解剖和实验的方法。指导中医理论发展的基本原则是调整、维持或恢复机体的自然功能，运用的是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。恽铁樵对此作过比较深入的分析。他从中医角度把人体组织结构称为内景，把躯体称为物质，把机能称为势力。他说西医是“研究物质之内景，两两对勘，然后知内景若何变化，势力若何变化”，意即把结构与机能统一起来。换言之，西医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，研究其相互联系，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整体功能，其特点是层次清楚，可用客观实验验证。中医则是通过临床变化观察判断，“就势力变化之不同，以推测内景而为之说，见某种势力有变化，悬拟必其所附之物质内景有若何变化。”故中医重视发挥抽象思维能力，强调善悟，把思维得出的结论与临床实践直接相验证。

第四，从使用的逻辑方法看，中医在五行学说上使用了演绎推理，更多的是使用归纳法，更重视因果关系。恽铁樵指出，中医重视因果关系的考察，“循因知果，见角知牛，用推理方法，……从多数之中可以求得公例”。他认为执果溯因是探求因果关系的较好方法，“循因执果，有时靠不住，而执果溯因，则千百不失一”。探求因果关系，较多地使用差异法，而证实它则靠临床效验。他说：“将健体与病躯比较，见病躯种种异状而知其为病，从种种不同之病推究致病之原因，而知病之来路；从种种病状观察其将来，而知病之结果。从病因病状以求免祸之道，而产生治法。以治法之有效者，……著为定法，即为医术也”。由于现实中疾病复杂多变，又须异中求同，“从此诸多复杂异点之中求其公例，消息其治法，治甲乙丙丁而效，治十百千万人而皆效，然后著为定例，……夫是之谓医理。理与术相合，见病能知起源，循因能测结果”。由于这种归纳带有或然性，所以一定要注意所以然，避免因“幸中”而误入歧途。他说：“幸中乃错误之前驱，有一次幸中，必有多数错误在后，幸中乃不祥

事也”。在推理方法中，中医还常用取类比象，类比推理之法。从恽铁樵这些分析，可以看出中医很少采用假设的方法，缺乏用实验证实或否定假说这一重要环节，演绎推理的形式也不完全，定量分析比较缺乏，这都是它不及西医之处。但它强调整体观念，注意观察疗效和整体机能调整，并在此基础上用因果关系推理，又有它特殊的优越性。

第五，从诊断方法说，中医的四诊，直接依赖于认识主体的感官，对医生个人的知识结构及经验，比西医有更大的依赖性。中医更着重于临床经验，常凭医生敏锐的感觉和独到的体会去捕捉病变的信息，恽铁樵说：“吾侪诊热病，手按病人颜额，与手掌比较，两处之热孰甚，则可以测知其热之为虚为实，此为热度表所不能量者。西医笑中医，以为用手试冷热，粗而不确，岂知妙用乃在热度表之上”。也和西医显著不同，西医对机体变化主要用定量化和客观化的标志测定，尽量避免单纯依赖感官而造成主观随意性。中医这种情况常给传授知识带来困难。如何提炼经验，使之成为有利于客观化和标准化的理论，是发展中医理论，保持中医特色的重要条件。否则，经验无法总结，绝技也会失传。恽铁樵对此十分重视，认为改良中医应做到诊断方面确有把握，用药方面确有标准。多次强调标准在诊断、治疗、中药等方面的重要意义。

第六，在治疗思想上，他强调须从“振刷内因”提高机体抵抗力入手。认为把恢复机体的自然功能放在首位，是中医治病的重要特色，是中医由习惯而酿成一种自然律，不背自然律是取得疗效的关键。为此，须坚持中医的整体观，诊病始终考虑整体的各种表现，勿孤立地抓某一症状。中医谓某脏腑患病常指机体某个方面的变化，而不是单指个别脏器。“体内各藏气，本是此呼彼应，一处受病，则他处起而救济，欲救济而不能，则为病态”。治病不过是“以药力助生理之救济”。他认为西医更偏重于具体病因的治疗，故常有执着和反自然之弊。

最后，他还指出中药和方剂的特色。中医发展大都不是发现新中药，而是不断地创立新方剂，或巧妙地加减变化旧方剂以提高疗效，中药更新也不象西药那样频繁，新旧方剂常并行不悖，东汉张仲景的许多方现仍有效地沿用着。我们对此应深入研究，但要防止片面的以为愈古愈好，陷入尊经崇古的错误。

恽铁樵对中西医的比较研究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，但仍是比较深入细致。他把重点放在弄清中西医的特点和长短，为在汇通中取长补短寻求客观依据。这也是发扬中医特色的核心问题，具有方法论的意义。



三、恽铁樵在指出中西医具有根本不同点，机械汇通行不通的基础上，强调中西医有着共同的认识对象，“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，中医治《内经》而精者亦能愈重病”，是殊途同归。中医治病有效，就有与西医相通之理。这就肯定了汇通的可能性。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果也充分证实了这点。恽铁樵又认为汇通是一个高难度的任务，中医脏腑学说与西医解剖概念之间，中医的六淫七情等病因与西医的病因之间，并无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，用解剖概念给中医脏腑机能定位根本行不通，硬在其间划等号，会导致抛弃脏腑学说的精华，丧失它在辨证论治中的重要作用的严重后果。因此，把西医知识作为解释中医理论工具的做法是舍本逐末，张冠李戴，结果只会失败。

恽铁樵指出，汇通的最好办法是取长补短。只有抓本即抓住病理才能知道中医真正的长短。不从病理切实探讨，就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，就会机械地对比，不“能知肋膜炎是风温，腹膜炎仍是风温；阳明府证为肠炎，少阴自利亦是肠炎”，不是用西医理论否定中医，就是拒绝从西医中吸取营养。我们认为，恽铁樵所谓病理，就是指规律性的东西，抓住它，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，汇通就有了客观基础。从这个观点看，搞中西医结合主要应阐发规律性的东西。又要看到，中医是临床医学，治疗方法多种多样。如恽铁樵所说：“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，但究此真是之方法，则殊途同归，方法却不是一个”。这个提法是合理的，因为一个科学概念命题能否成立，不在于它和以往的知识是否一致，而在于它是否反映客观实际，至于达到真理的途径，可以多种多样。整个医学是这样，中西医的发展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，都应多种多样，越是多样，才越能实现统一。只提倡一种办法，一种模式，一条路走到底，只能扼杀医学发展的内在活力。除科学已证明的谬误之举外，什么办法都可采用。在科学中如果没有自由，不许创新，则将走向衰落。

恽铁樵非常赞赏西方学术的创新精神，称赞“西国医学日新月异，真理之获得无岁无之”。他认为医学发展尚不完全，须不断改进，“凡能永久传世的东西，无有不变化的”，守旧不变，是违背“演进的公例”的。他强调中国古代医学的光辉成就，是因为具有创新精神，赞颂张仲景是在“横断众流”，不为“当日时医所束缚”的精神状态下完成其巨著的。他认为在中医界一部分人中间长期存在着崇古习惯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，发明者经常受到打击和压抑，是中国医学不发达之原因。可谓一语破的，对于搞好中西医结合，发掘

中医宝库都有借鉴意义。我们研究中医，发扬中医特色，就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整理、提高，推动它发展和前进。没有创新精神，没有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强烈愿望，就不可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，就无法保持其特色，使中医得到振兴。

恽铁樵主张把实验方法移入中医，并拟集资购仪器以研究。他这种不拘泥于形式，不着重于印证，不把西医知识作为注疏中医理论的工具，鼓励创新精神，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二者的本质和引进近代科研方法上是很有眼力的。我们认为，中医在保持其特色的基础上，广泛引进先进科学技术，这是实现中医现代化，使它保持活力，不断前进的必要条件；如果把中医与现代科学隔开，不与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医学接触，那就只能丧失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医发展提供的良好机遇，丧失中医本应大步前进的可能。

恽铁樵还提出这样一个命题：“大约甲学说与乙学说相摩相荡，则产生丙种新学说，此为历史上之公例”。“盖凡百学问，由两个系统化合而成者，必发生新效力，医学自不能为例外”。这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。不同学派的争鸣，不同边缘学科的互相渗透，不仅给科学发展带来生命活力，触发新思想和新观点的诞生，而且会产生新的结合部，形成科学的新的生长点。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已形成了一些很有希望的萌芽，如辨证与辨病结合，创造模拟中医某些证的动物模型，用现代科学方法揭示经络的实质等，都可能成为推进中医理论的突破口。恽铁樵说：“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，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，更无第二途径”，他认为“相周旋”既非“舍己从人”，也非“漫然杂揉”，而是“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合化，以产生新中医”。“吾侪研究所得，渐与古说相离，不中不西，亦中亦西，命之为新中医，当无愧色”。创造的这种新中医应当是本古人学说与西学相印证，为术较古人为精，视西人尤密。既保持中医特色，又使之进入现代化的新阶段。他这个期望应该说是合理的。

恽铁樵对中西汇通提出的一些方法论方面的见解，对搞好中西医结合，发扬中医特色都有重要的意义；他对中西医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的一些见解，也值得重视和进一步钻研。尽管受时代的局限，他的提法中不免存在某些缺点，个别论点甚至很不科学，但其思想主流，却是可资借鉴的。在评述中也阐述了我们的一些想法，目的是和同志们共同探讨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。

（本文所引文献均选自恽铁樵《药龠医学丛书》）